

珞珈国学丛书
研究系列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谢贵安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究系列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谢贵安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 谢贵安著. — 北京: 商务印
书馆, 2016

(珞珈国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1832 - 3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792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谢贵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832 - 3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

定价: 86.00 元

总 序

我们武汉大学有国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近代以来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赓、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诠与中西学术互动，有深厚的基础。

2001年，我们综合文、史、哲的师资，在国内首先创办了国学本科试验班。此前全国高校尚没有办这样的国学班。我们坚持下来了，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十二年招生。我们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对我国传统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与宗教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一定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科走向，又会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的复合型人才。国学班采用“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克服了六十多年来我国大陆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又只有通论、通专史课程而不读经典的毛病。我们强调从认字开始，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文献学外，相继开出《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四书》、《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文选》、《文心雕龙》与出土简帛文献等的导读或研读课程，还开了国学通论、国学研究方法论、海外中国学、印度佛学等课程。我们还请人用英语开了《理想国》、《圣经》等西方经典课程。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反

II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响。2010年12月,“国学”专业作为武汉大学唯一的人文学实验班纳入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珠峰计划)”,成立了“弘毅学堂”国学班。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学研究和教学,同时为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学子提供继续深造的专业平台,我们于2005年至2007年挂靠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招收国学硕士生。2007年底,我校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行增列了国学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于2008年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这也是国内首创。我校国学硕士、博士点设有:(1)经学研究方向;(2)子学研究方向;(3)史部典籍研究方向;(4)集部研究方向;(5)佛教与道教研究方向。目前已经有两届硕士毕业生,一届博士毕业生。

在十年学科建设的基础上,2010年3月,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打好坚实的基础,也强调开放性,我们常请海内外知名专家给国学班同学上课或做学术演讲。同时,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强调实地踏访古文化遗迹。

武汉大学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十多年来,我们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本着邓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开拓创新。我们不为别的,只是想为将来留下一点能读古书的人,把文化传承下去,并与各文明对话。我们的教育不仅是知识性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价值理想、较高的人生境界与认真做事的精神,故学生们一部分成为关心国事民瘼的读书种子,另一部分毕业后从事其他各项事业。他们都感到国学训练使他们受益无穷。我们鼓励学子们做推广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志愿者。他们中有不少人到海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国学班、国学硕博士点、国学院的设立,所为何事?

首先，是对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的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先后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但我们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和艰深的学术内容，不应当徘徊在文化消费的“潮流”和“时尚”层面上。国学班的教育，是对社会上“国学热”浪潮的严肃的教育回应。

其次，是对大学文科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国大陆现有的大学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主要是原苏联“概论加通史”的模式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文、史、哲的分割，存在一定的弊病。因此，我们尤其强调中西经典的教育与文、史、哲的融通，作为对现有人文学科分科的补充，希望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以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学生原创性的培育。

再次，是对复合型人才社会需求的认识。随着中国逐渐振兴富强，中国文化也在复兴。中国不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在国际上也应该参与到与异质文明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之中。面对转型与文化复兴，社会将逐渐出现对有深厚国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我们国学院正式成立之后，即谋划出版一套《珞珈国学丛书》，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教材系列，另一个是研究系列。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在我们国学院任教或做过研究的严谨的老中青学者。教材系列是经我们本科与研究生教学试用过的优秀教材，可供全国各高校文科教学选用。研究系列既有学术专著，也有专题学术论文集，书稿都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查，力图为学术界奉献学术精品。当然，各书文责由各位作者自负。

承蒙商务印书馆领导与同仁的厚爱与支持，经协商，这套丛书在

IV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该馆出版。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各级领导与各书的责任编辑同志。

这套丛书卷帙浩繁，难免出现问题与瑕疵，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教。

是为序。

郭齐勇

壬辰岁末于珞珈山

目 录

试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

——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 ····· 1

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 ····· 21

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交叠与分野 ····· 35

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 ····· 52

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 ····· 65

论纪传体史书对实录体史书的影响 ····· 86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 ····· 97

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 ····· 130

《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 ····· 148

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 ····· 161

《五代实录》修纂考 ····· 182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 216

《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 ····· 230

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 ····· 246

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 ····· 262

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 ····· 283

VI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 307

《清实录》世传版本考 …… 333

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 …… 373

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 …… 391

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 …… 411

试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

——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

一、儒学与史学的关系

儒学即儒家学说，自西汉以来便成为中国传统的正宗经学，儒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及儒家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孔子和孟子的著述《论语》、《孟子》等，均成为中国学术经典和政治思想指南。儒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和意识形态起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史学自然也不例外，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支配作用。然而，史学对儒学并非完全被动地反照和映射，而是在某些时候或特定的背景下，对儒学和经学常常有重要补充甚至修正。

儒学与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本文探讨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意在证明经学与史学的相互关系。经学与史学在古代学术分类中，分居四部中的前两部，即经部与史部，是中国传统学术中重要的内容。儒学与史学关系有着颇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史学尚未充分发展时，史学是依附于经学的。在西汉末至东汉时产生的目录著作，如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等，将当朝的学术分为六类，这六类中是没有史学位置的，史书附属于经类的《春秋》下。当时的六门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的“史记”便隶于《春秋》经下面。但至曹魏时的郑默，开始将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刘宋谢灵运跟进后，基本定型。南朝梁代阮孝绪虽然没有像郑默那样分为

2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四部，但所著目录著作《七录》将当时的学术分为：经典录内篇一，分易部、尚书部、诗部、礼部、乐部、春秋部、论语部、孝经部、小学部；纪传录内篇第二，分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其他的则为子兵录内篇三、文集录内篇四、术技录内篇五和佛法录外篇一、仙道录外篇二。除去外篇，基本上算是四部分类法。而且纪传录就是史部。至唐代修《隋书·经籍志》时，经、史、子、集四部正式定型，史学最终始获得独立于经书之外的地位。至清乾隆帝时，特命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强化了四部分类法。以后学术分类只是在小的方面屡有增减，但再也没有从大的分类上有所突破。尽管在学术类别上获得独立，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史学仍然是经学的附庸。以儒学为内容的经学，左右着史学的发展。然而，自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经史分途的格局又有了合而为一的趋势，史学从史料角度统一经学，消解经书的尊崇地位，认为经书不过是古代的历史资料，《尚书》仅仅属于“断烂朝报”，王守仁、章学诚等提出的“五经皆史”、“六经皆史”的观念，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的新动向。近代梁启超“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更将这种观念推向极致。

探讨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对于传统学术的运动过程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本文重点探讨自唐迄清期间，儒学对史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史书编纂上所产生的支配作用。在传统史书中，实录体史书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史学体裁，是王朝政府为先皇及其朝政所修的当代史，以起居注、档案和公文为主要史料来源，为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中的重要一支，基本形态属于编年附传体，一度与纪传体和编年体构成传统史学鼎足而三的基本格局。作为官方组织纂修的史书，实录体史书的编纂受到了当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支配和影响。通过

考察实录体的纂修活动及其过程，可能为儒学何以对史学发生作用提供具体而生动的例证。

二、实录主题为儒家纲常

在实录体盛行的唐迄清代，儒学早已获得独尊地位，使得实录体史学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烙印。实录的主题是反映儒家纲常伦理，旨在突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

实录体的创立和盛行，本身就是与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发展相适应的，是为了突出儒家君为臣纲的观念。实录体同时兼有帝王编年与大臣列传，与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有相通之处。不过，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其本纪与列传分属不同的部分，虽在内在结构上是列传环拱帝纪，但在外在形式上列传与本纪却是并列的两个部分。实录体虽同时具有帝王编年和列传，但帝纪与列传却以编年的形式，混编在一起，使列传无论从内在结构上还是外在形式上，都附属于帝王编年，表明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强化。以帝王编年为主线的实录融入传记后，在保持记事的同时，增加了记人的分量。实录的最大传主是皇帝，同时又融入众多的大臣传记，凸显了司马迁《史记》确立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主题，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使实录体成为更加适合中央集权制的史书体裁，从而获得迅猛的发展。自唐以后，五代、宋、辽、金、明诸朝均修有“编年附传”形式的实录体史书，自成一系，绵延不绝。

实录体是皇帝个人及其政权的专史和独有体裁，渗透着儒家“君为臣纲”和强化皇权专制的思想观念。实录将皇帝塑造成神圣之

君和天之骄子，试图通过“君权神授”观念，将皇帝及其专制统治说成是顺天应人和天命所归。唐初贞观朝的史臣在修纂实录时，便为唐朝统治者李渊、李世民附会出异象。如《唐高祖实录》便曾虚构武德初，晋州人吉善在羊角山遇见乘白马的白衣老父，让他回去告诉李渊将会当上天子的故事。实录又曾记载郇州献瑞石，上有文曰“天下千万”。这些描绘，实际上在将李唐王朝之得天下，粉饰成早有预兆。《明太祖实录》卷一则将朱元璋虚构成神灵之子，谓其母食黄冠所赐白药而生之：“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清世祖实录》卷一称世祖福临于崇德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时诞生于盛京，“孝庄文皇后方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以为火，近视之不见，如是者屡。众皆大异。诞之前夕，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孝庄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见。既寤，以语太宗。太宗曰：‘是异祥，子孙大庆之兆也！’次日，上诞生，视之顶中，发一缕耸然高起，与别发迥异。是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上生而神灵，聪明英睿，志量非常。天日之表，龙凤之姿，仪范端凝，见者慑服”。实录又将皇帝描写成“生而知之”的聪明英睿之人。如《明英宗实录》卷一称英宗“稍长，能知书。宣宗皇帝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辄喜动颜色，至或以玩好奉之，若不经意然。居常顾盼之际，烨然有威，立其侧者，皆若上旁睨之不敢稍怠肆也。及宣宗皇帝宾天，上始九龄，然哀疚之诚，怆惨之容，已出于圣性之天然矣”。《清宣宗实录》卷一称道光皇帝“聪明天亶，目下十行”，“经史融贯，奎藻日

新”。实录还将皇帝塑造成道德典范。如《清太宗实录》卷一称太宗皇太极“天锡睿智，恭孝仁惠，诚信宽和，圣德咸备”；“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清宣宗实录》卷一谓道光皇帝“生有圣德，神智内充”。《清穆宗实录》卷一称同治皇帝“聪明天亶，孝敬性成”。《清德宗实录》卷一谓光绪皇帝“帝德日新，圣功益裕。所以厘百工而熙庶绩，遵成宪而焕新猷者，胥于是乎基之。上俭约本乎性初，嗣后三十四年，器用服御，不敝不改。孝事宫闱，圣情肫挚，承迎娱悦，无所不尽其诚。至夫昌明教育，亭毒黔黎，靡不一秉慈谟，蔚为辰告。用是觀光扬烈，纘十三载中兴耆定之脉；创制显庸，开亿万禩宪政文明之局。天人协运，中外归心，懿欤盛哉”。凡此种种，都是儒家强化纲常观念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体现。

与此同时，实录还大量记载了节烈妇女的事迹，是儒家“名教”对史学影响的结果，是儒家“夫为妻纲”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渗透。

三、实录内容多有儒学特色

实录体史书在内容上，很多记载都是与儒学相关的事项。儒学的基本概念是仁与礼^①，因此，实录中充斥着对礼仪的记载。如皇史宬本实录尊藏时，《清实录》都要记载其礼仪，皇帝须亲临行礼。《清仁宗实录》载，嘉庆十二年十一月辛丑，“以尊藏《高宗纯皇帝实录》、《圣训》于皇史宬，上亲诣行礼”^②。《清宣宗实录》卷七二亦载，道光四年八月辛巳，谕军机大臣等：“九月初一日，朕亲诣皇史宬行礼。无庸奏拟仪注。着先于皇史宬殿门内设香案一，香炉一，香盒

① 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引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一八七，嘉庆十二年十一月辛丑，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一，亲自拈香行礼。无庸派人递香。御前大臣、御前侍卫随入殿门内，乾清门侍卫俱在殿门外。至实录馆总裁及礼部各员均毋庸随往。”于是，于九月庚寅朔，“以尊藏《仁宗睿皇帝实录》、《圣训》于皇史宬。上亲诣行礼”^①。此后，每届实录修成尊藏入宬时，皇帝便亲诣皇史宬行礼。^②由于《清实录》尊藏皇史宬礼仪很隆重，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一件大事和值得大庆特庆的喜事，因此，这一天群臣均不敢上奏言刑狱等不吉利之事，怕触犯了这一喜事。嘉庆时，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实录》移贮皇史宬正殿，仁宗是日“至承光殿传膳办事”，结果“各部院衙门惟长麟因谢恩递折”，“禄康、文宁、明亮等因该旗值日陈递无事奏片，其余无一奏事者”，于是当即“召对长麟时加以询问”，据称“本日因恭移《实录》、《圣训》至皇史宬尊藏之第一日，典礼吉期，是以内阁刑部，将刑名章奏均敬谨回避”。^③不仅是尊藏实录，举凡祭天、郊祀、祭祖等所有重要活动的礼仪都由实录加以详细记录。

以人物而论，实录载录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儒臣。实录附传反映的主要对象便是儒臣。实录体史书基本上属于“编年附传”体，一般都有人物附传，这些传记多以儒臣为其传主。纪传正史中的《儒林传》和儒臣专传反映了史学对儒学的承认和尊重，在实录体史书中，虽然没有类传，但仍有不少人物附传反映了儒家的重要地位。儒家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读书成功后的儒生都步入仕途，成为儒臣。书生成为儒臣的重要途径是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的儒臣，成为实录附传记载的重要对象。《唐实录》除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七三，道光四年九月庚寅朔，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清文宗实录》卷二二三，咸丰七年四月甲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清德宗实录》卷一一六，光绪六年七月甲午，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一八六，嘉庆十二年十月庚寅，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了《顺宗实录》外全部散佚，从仅存的《顺宗实录》来看，里面共有7个人物附传，即吐蕃吊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赠礼部尚书张荐，衢州别驾升秘书少监令狐峘，左散骑常侍致仕张万福，故忠州别驾、赠兵部尚书陆贽，故道州刺史、赠左常侍的阳城，被贬渝州司户的王叔文，被贬宰相韦执谊。这7人中，6人是儒臣。如张荐，有良好的家学渊源，“祖文成，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张荐本人也“聪明强记，历代史传，无不贯通”，还“兼史馆修撰”，并“为太常博士”。令狐峘是著名的史学家，修有《唐代宗实录》。陆贽是典型的儒臣，“年十八，进士及第，又以博学宏词授郑县尉”，还“选为翰林学士”。阳城“好学，贫不能得书，乃求入集贤为书写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经六年，遂无所不通”，是一位通儒。王叔文是位“读书知理道，乘间常言人间疾苦”的儒臣。韦执谊更是“进士对策高等，骤迁拾遗，年二十余入翰林”的儒臣。只有张万福一人“以祖父业儒皆不达，不喜书，学骑射”，是武将而非儒臣。

《宋实录》也只残存了《太宗实录》20卷（《太宗实录》完帙为80卷），据笔者统计，这20卷中，保存人物传记68个。其中儒臣与武将平分秋色，儒臣入附传者有边珣、刘载、吴鉉、石熙载、李穆、汤悦、程羽、杨亿、高颀、沈伦、王佑、朱覃、李恽、麻希梦、崔仁冀、李继凝、杨守一、和峴、贾黄中、李昉、张观、喻蟾、张茂宗、宋琪、苏易简、张洎26人，武将有石守信、沈承礼、高继元、曹光实、刘遇、陆万友、田钦祚、王杲、刘廷让、李崇矩、伊审征、陈廷山、王继升、吴虔裕、郑彦华、侯延广、郭密、皇甫继明、曹思进、赵滔、薛惟吉、傅思让、尹继伦、刘宇、安忠、田重进26人，宗室世家陈王元佑夫人李氏、赵廷美、赵德隆、钱俶、周保权、李从善、杜审进7人，经济之才有陈从信、张美、张平3人，术士赵自然1人，

富豪李益1人，其他身份入传记者有刘吉、马峰、向拱、刘厚德4人。武将之所以与儒臣平分秋色，比较特殊，因为《宋太宗实录》是宋初的实录，宋接战乱的五代，武将功臣较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太宗朝谢世，因此为实录所记载。而承平之后的真宗以后的实录，武将比例将会大大减少，儒臣比例将会大大上升。关于《宋实录》中的人物附传，还有一处可以考察，那便是南宋杜大珪从《宋实录》中摘录的26个人物附传，这26个人物附传除了2人为《宋太祖实录》中的武将（潘美、王全斌）外，其他均为真宗、哲宗、徽宗、神宗实录中的附传，并且基本上都是儒臣（张齐贤、吕公著、文彦博、刘摯、王安石、吕惠卿、唐介、郑獬、吴中复、吕大防、冯京、张商英、韩维、蔡确、章惇、范祖禹、邹浩、刘安世、曾布、曾肇、王拱辰、韩缜），有的甚至还是儒学大师和理学名家（程颢、程颐）。

《明实录》则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中的附传多为儒臣传记。《明实录》各朝修纂凡例中均有这么一条：“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歿皆书卒，及概见其行实。”虽说是文武并存，但实际上记录下来的多是儒臣。

标榜稽古右文的清朝，其《清实录》虽然步《元实录》后尘，取消了人物附传，但其所记内容，基本上是以儒臣的活动为主。甚至八旗军事活动及满蒙事迹也越来越少。随着清朝的汉化，《清实录》也随之汉化并儒学化了。

四、实录编纂以儒学“春秋笔法”为指导

孔子在删削《春秋》时，被认为融进了春秋笔法，即用微言来